

辜鸿铭 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刘中树 付兰梅 吴景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辜鸿铭

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刘中树 付兰梅 吴景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辜鸿铭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 刘中树, 付兰梅, 吴景明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
ISBN 978-7-108-05218-6

I. ①辜… II. ①刘…②付…③吴… III. ①辜鸿铭
(1856 ~ 1928) — 思想评论②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近现代
③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近现代 IV. ① K825.4
② B250.5 ③ 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0317 号

责任编辑 关丽峡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

字 数 312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本书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
（批准号：03JB750·11-44012）研究成果

目 录

导论 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思想理论认识因缘 (1)

一 辜鸿铭的政治认同 (15)

(一) 辜鸿铭的国家认同 (19)

1. 辜鸿铭的国家归属意识寻踪 (21)
2. 从“花国”到“丛病之躯”：辜鸿铭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 (29)
3. 辜鸿铭国家认同的生成 (35)

(二) 辜鸿铭的国家政权与政治精英认同 (46)

1. 辜鸿铭的国家政权认同剖析 (47)
2. 辜鸿铭的政治精英认同透析 (57)

二 辜鸿铭的思想文化认同 (66)

(一) 发辫、服饰与辜鸿铭的民族、文化认同 (67)

1. 身体政治学视野中的服饰与发辫 (68)
2. 发辫、服饰: 辜鸿铭最重要的身份标识 (70)
3. 发辫、服饰与辜鸿铭的民族身份、中华文化认同 (76)
4. 从身体到著作: 辜鸿铭民族文化认同的理性显现 (86)

(二) “良民宗教”的建构与推行

——辜鸿铭文化民族主义内涵 (93)

1. 文化民族主义理论与辜鸿铭的“良民宗教” (93)
2. “良民宗教”的基础: “忠诚之道”指引下的民族认同 (97)
3. “良民宗教”的核心: 心灵与理智谐和的国民性建构 (101)
4. “良民宗教”的宗旨: 民族救亡及国际新秩序的推行 (107)
5. 辜鸿铭文化民族主义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113)

(三) 寻求文化融合的“挹西扬中”

——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内涵 (115)

1. 辜鸿铭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115)
2. 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 (118)
3. 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内涵 (124)
4. 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与局限 (131)

三 辜鸿铭与鲁迅两极文化认同比较研究 (133)

(一) 返传统的辜鸿铭与反传统的鲁迅: 辜鸿铭与鲁迅文化认同比较之一 (142)

1. 辜鸿铭的凝视策略与鲁迅的观看之道 (142)
2. 最保守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辜鸿铭 (147)
3. 最激进的文化激进主义者鲁迅 (160)

(二) 凝望身、家、国: 辜鸿铭与鲁迅文化认同比较之二 (177)

1. 身之凝视 (178)

2. 家之回眸 (200)

3. 国之望诊 (217)

(三) 他者的承认：辜鸿铭与鲁迅文化认同比较之三 (230)

1. “看朱成碧”：“观于人”的辜鸿铭和鲁迅 (236)

2. “看杀卫玠”：“观于异”的辜鸿铭和鲁迅 (249)

四 辜鸿铭的海外影响与接受及其文化现象成因 (267)

(一) 东西方文化：从主观融合到客观背离 (267)

1. 辜鸿铭在东方国家的接受与影响 (268)

2. 辜鸿铭在西方国家的接受与影响 (275)

3. 文化与身份认同实践中的双重背离 (284)

(二)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替罪羊”

——辜鸿铭现象及其悲剧成因 (285)

1. “替罪羊”文化内涵的转换与辜鸿铭现象的凸显 (285)

2. 辜鸿铭的文化尴尬与“替罪羊”机制的生成 (289)

3. 从文化保守主义“替罪羊”到现代性反思“文化精英”的悖论性转变 (302)

结语 言说不尽的辜鸿铭 (309)

附录一：国内辜鸿铭研究述评 (311)

一、1978 年之前的辜鸿铭研究 (314)

二、1978 年以来的辜鸿铭研究 (320)

附录二：辜鸿铭生平轶事与创作研究管窥 (339)

一、辜鸿铭生平轶事研究管窥 (339)

二、辜鸿铭的创作情况研究 (352)

附录三：1840—1936 年社会历史文化场中的辜鸿铭与鲁迅 (355)

附录四：辜鸿铭研究资料汇编 (386)

后 记 (406)

导论 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思想理论认识因缘

研究历史人物的世界观、人生体验、学识才能、学术品格、理论思想、思维方式等，以及由此所支配的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及其历史影响，是知人论世认识历史的基本工作。以上几个方面也是人的史识的决定因素，史识是历史行为主体历史行为的意识规范和动力，准确科学地认识掌握历史人物的史识，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历史现象，认识历史规律。辜鸿铭这位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个性和独异思想、在中外都有独到影响的“文化怪杰”所呈现的“辜鸿铭现象”，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产物。

辜鸿铭生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卒于1928年。正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闭关自守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中经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洋务运动（“同光新政”，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中法战争（1883—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签订《马关条约》）、维新变法运动（1895—

1898)、义和团运动(1899—1901)、八国联军进攻中国(1900—1901,签订《辛丑条约》)、日俄战争(1904—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1905)、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1908)、辛亥革命(1911)、袁世凯称帝(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俄国十月革命(1917)、“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1927)、“五四”爱国运动(1919)、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等社会历史事件,中国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面对变革时代的历史现实,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的辜鸿铭的独有人生经历,造就了这位除了母语汉语,还熟练掌握英、法、德、拉丁语,通晓东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独钟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我深邃思想主张的人文学者。他虽显得有些痴狂,但却愤世嫉俗、关注现实,指点江山、狂发议论,其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观点大都体现在他对上述历史事件的议论中。他对中外历史的描述、对中外文化的见解不无偏激误读之处,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雅各宾主义、悲观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对基督教等宗教的理解也不乏曲解之嫌,但他却在对西方科技现代化、文化现代性的反思中,对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钟情和阐释中,力图以中国传统思想阐释西方古典文明,批评西方的现代性,构建了他的“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观,形成了他的“尊王崇孔宣儒扩展”的文化认同,这与鲁迅的“立人批孔非儒拿来”的文化认同,成为近现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对立的核心理念。辜鸿铭对“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等概念的提出和阐释,真切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理念、社会历史和文化观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这是解读辜鸿铭人文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知人论世”认知辜鸿铭其人的本原。

辜鸿铭在中国已从被人们视为“怪物”、历史的琐谈而成为被关注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研究的不可绕开的历史人物。对此，黄兴涛先生做了大量的奠基性的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译的由海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辜鸿铭文集》（上、下），就是我们研究阐释辜鸿铭的第一手资料和最基本的史料依据，我们也就是以忠于历史事实的态度，从辜鸿铭留下的文字中来审视辜鸿铭，阐释他的“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的社会历史文化观。

一

辜鸿铭在他的文章、讲稿中曾十几次提到“良民宗教”的概念，以此概括表述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宣扬他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观点。他认为西方的基督教、东方的佛教都不适宜具有悠久传统文明的中国。中国人不热衷于宗教，却信奉孔子学说，以孔子学说为其立身行事的信条，因此，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佛教这样的国教，但却把孔子学说视为国教。辜鸿铭以“良民宗教”概括其思想内涵。

在辜鸿铭的理想诉求中，这种“良民宗教”就孔子学说的内在意义解读之，它强调“良民宗教”就是“孝悌之教”、“忠诚之教”。它告诉人们为何而生活，怎样生活、怎样真正地生活之真谛，即道德的生活。佛教、基督教的宗旨之一是教导人们怎样成为一个好人，而“良民宗教”则按照孔子学说教导人们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社会公民。辜鸿铭解释说：“首先，和平、秩序与安宁乃至国家本身的存在，不是依赖于法律和宪法，而是仰赖于中国的每个臣民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过一种真正虔诚的生活，或时髦地说，一种道德

的生活。其次，孝弟应作为道德生活或虔诚生活之本；再次，良民宗教的秘密是人们尽义务而不是争权利。人们不对权威表现出不信任和怀疑，而表现出对它的尊崇。孟子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良民宗教：‘爱其亲，畏其上，世永昌。’”^{〔1〕}

孝悌，辜鸿铭认为它是孔子学说的儒教与其他真正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的根本区别之要义所在。依辜鸿铭之见：“为了保持良好的心境，思考灵魂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思考上帝把人类置于其间的人世，以根据上帝的意愿完成其功业。如果人们希望对上帝尽义务，那么同时也必须对人类尽义务，即孝悌之义务。”^{〔2〕}做到了孝，就是孝子，在家孝顺父母；做到了悌，就是君子，在社会上友爱亲朋，对上者谦恭或守法，良民就是孝悌之人，有了孝悌之心，其内心也便有了对于权威的尊崇。因此，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民之所以在统治事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她不是在宪法上费尽心力，而是找到了统治的根本，让中国人尽力使自己成为良民（孝弟者）”^{〔3〕}。有了“良民”就有了中国的和平、安宁与秩序，“中国的和平、安宁与秩序并不依赖于皇帝的仆人、皇后侍女的品格，而依赖于生活在这块国土之上的所有的人们，不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外国的，还是中国的，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过一种虔诚的生活。即，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尽其义务而不是坚持其权力，也就是尽其良民之义务”^{〔4〕}。据此，辜鸿铭提出治理中国需为之全心致力的是“教化民众，使之孝弟，而不是为宪法而费尽

〔1〕 辜鸿铭：《呐喊·九 孔教研究之二》，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546页。

〔2〕 同上书，540页。

〔3〕 同上书，542页。

〔4〕 同上书，546页。

心机”^{〔1〕}。

辜鸿铭从欧洲的社会变革中看到宗教和法律、教士与军警已无能为力于维护社会秩序了，解决欧洲社会问题，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文明难题的钥匙只能是中国的“良民宗教”，是“良民宗教”的爱和正义的法则。“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良民宗教”也是“忠诚之教”。对此，辜鸿铭是这样解说的：“什么是爱的法则呢？良民宗教教导人们，爱的法则就是要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又是正义的法则呢？良民宗教告诫人们，正义的法则就是要真实、可信、忠诚；每个妇女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每个男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在此，我想最后指出，这种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Duty of Loyalty），忠诚，不仅表现在行事上，而且蕴藏于内心……”^{〔2〕}这就是“历二千五百年之久，用不着教士和军警，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国人”^{〔3〕}。

基于对“良民宗教”的信仰，辜鸿铭认为中国历代的盛世统治，特别是当朝的清王朝的君主政治是符合“良民宗教”精神的政体。它教化民众，使之孝悌，以自然的情感生活，遵守道德准则的生活，“统治中国人的不是法学家和法律或成文宪法，而是统治阶层和教士阶层不成文的道德准则。因为他们维持着称之为文明的道德法则，人民因此安居乐业”^{〔4〕}。与此相应，辜鸿铭还附会

〔1〕 辜鸿铭：《呐喊·九 孔教研究之二》，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543页。

〔2〕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导论》，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6页。

〔3〕 同上书，25页。

〔4〕 辜鸿铭：《宪政主义与中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185、186页。

说，正是在“良民宗教”的教化下，“中国人在选择他们的皇帝时，并不像美国人选择他们的总统那样，认为这个人将促进他们的利益，会为他们做‘好事’；中国人选择皇帝，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灵魂中，认为他是一个绝对比他们自身更优秀更高贵的人”^[1]。也即是孔子所说的“尊贤为大”。辜鸿铭极力推崇慈禧皇太后就是这样的君主、高贵的人，称她胸怀博大、品质高尚、灵魂伟大、智识杰出、气量宽宏，她执掌皇权没有个人的私欲，不谋私利，赞誉她是出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以德行事，明智地处理国事的能干的政治家。这些牵强的溢美之词，充分表露了他恪守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坚守君主政体，忠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君主统治政权的顽固保皇派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他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犯，对清王朝的打压，视太平天国运动为叛乱，称戊戌变法的康有为（1858—1927）等为乱臣贼子，反对辛亥革命，无一不是出于他的“良民宗教”观和保守的政治意识。以致清朝君主政体被推翻之后直至他逝世，他都坚持留着发辫。胡适（1891—1962）曾写道：“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养长，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2]他的这种表现其意是“在德不在辫”，他表白：“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于它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3]这是政治立

[1] 辜鸿铭：《宪政主义与中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179、180页。

[2] 胡适：《记辜鸿铭》，黄兴涛编：《旷世怪杰——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22页。

[3]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雅各宾主义的中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90、291页。

场、政治态度、政治观点的表白。

二

“良民宗教”的理想社会是“良治秩序”的社会。辜鸿铭在文章和讲话中也用了较多的笔墨谈他的“良治秩序”理论，阐释他的社会历史观。什么是辜鸿铭所说的“良治秩序”，《辜鸿铭文集》的译者认为，从辜鸿铭的《尊王篇》和其他文书中辜鸿铭对这一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辜鸿铭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良治秩序”的统治，应该表现为政治清明、社会井然有序，人民循规蹈矩、遵纪守法^{〔1〕}。

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治，辜鸿铭从三个方面阐述他的观点：一是民众要有廉耻和责任感、义礼并重，忠诚政教，做识礼的好人。忠诚于政教，忠诚于中国文明，也就是忠诚于皇太后；二是地方掌权者为良治负责，“只有当每个总督和巡抚，以及所有在职的高级官员，都用脑袋对皇太后和皇上负责，不只是为了保护洋人，更不是为了讨得外国政府的欢心，而是为了良治，即，为了每个下属的品德、行为和生计，为了托付给他们的人民的幸福与长治久安时，在中国，才有可能存在真正的良治”^{〔2〕}。辜鸿铭是关注民生的，他的《爱国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3〕}反映了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切。他不赞成太平天国、布尔什维克叛乱，但

〔1〕 见《尊王篇·序言》注释①，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9页。

〔2〕 辜鸿铭：《尊王篇·为了中国的良治》，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64、65页。

〔3〕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爱国歌》，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428页。

却认为那是民不聊生的暴乱举动；三是列强绝对地承认和尊重中华帝国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利（在目前，只有裁判外国侨民除外），认可“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治体中至高无上的权威”^{〔1〕}。辜鸿铭强调“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影响，乃是中华帝国稳定与统一的唯一保证”^{〔2〕}。统览中国历史，辜鸿铭认为良治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或好或坏的不同状态，而最好的良治时期则是清朝满人当权时期。他描述满人当权至辛亥革命二百五十年的社会历史变革是：“1. 满人当权 太平天国暴乱后到来 2. 中产阶级的崛起 中日战争后到来 3. 满人重新掌权 义和团事变后到来 4. 一个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在这场‘新学’拳民暴乱之后，我们面临了 5. 群氓掌权。”^{〔3〕}“中国在满人统治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真正花一样的国度。当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中产阶级在中国掌了权，中国变成了一个庸俗市侩的民族。”^{〔4〕}他把李鸿章掌权称作中产阶级掌权，向西方物质实利主义学习，丢掉儒学教化，把中国变成“一个粗俗丑陋的中国”。颓败之势从李鸿章掌权开始，中间虽有满人重新掌权，但已无力挽救，直至爆发了辛亥革命。辜鸿铭把恢复中国良治的希望寄托于以“良民宗教”教化民众的慈禧太后和反对代表“富人、中小商人和买办阶层利益”，搬用西方陈套的李鸿章官僚买办集团的清流党。

辜鸿铭把以张之洞、张佩伦，还有李鸿藻为首领、以翰林院翰

〔1〕 辜鸿铭：《尊王篇·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于皇太后本人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1页。

〔2〕 同上书，23页。

〔3〕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雅各宾主义的中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84、285页。

〔4〕 同上书，286页。

林为主体的清流党的清流运动比拟为英国的牛津运动。牛津运动是19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等发起、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新教倾向，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强调公教（天主教）的教义权威是绝对的，“公”意为恪守早期的统一教会的教义，维护正统教义和教会礼仪，以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和世俗权力的干涉。清流党是指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松散的政治派别，以进士、翰林为主的清谈群体，热衷诗文唱和、学术探讨、议论政治，标榜风节、关心国是、针砭朝政、憎恨贪腐、效忠皇太后，对外主张强硬外交，反对西方文化，独尊孔孟。19世纪80年代后的称北清流，90年代后的称南清流，或称前后清流派，后统称清流党。辜鸿铭共鸣于牛津运动的复古与反自由主义和清流党清流运动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更严格地按儒家原则办事，以二者相比附，阐扬自己的良治观点。他寄希望于培养、发现、任用忠于皇太后、恪守“良民宗教”、维护“良治秩序”，又懂晓中西方文化，具有“扩展”心态，吸收西方符合“良民宗教”精神，有益“良治秩序”建设，实现良治社会的近似于清流党又高于清流党的人才。

辜鸿铭对世界历史变迁和中国社会历史的议论，往往为符合他的“良治秩序”观而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比如他说中国在汉高祖时就进入了真正的民主时代，说满人统治使中国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家，都不啻为胡言乱语，他对牛津运动与清流党的比较论述也多有牵强附会之意。我们在指出他的偏误的同时，主要是从这里看他的社会历史观。他对西方物质实利主义的批评，他对生搬硬套西方学说的文人学士的“新学”的批驳，他把袁世凯当政与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混为一谈，斥之为群氓掌权的灾难，他反对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力推权威崇拜，等等，其中虽然也不无可以提醒人们思考